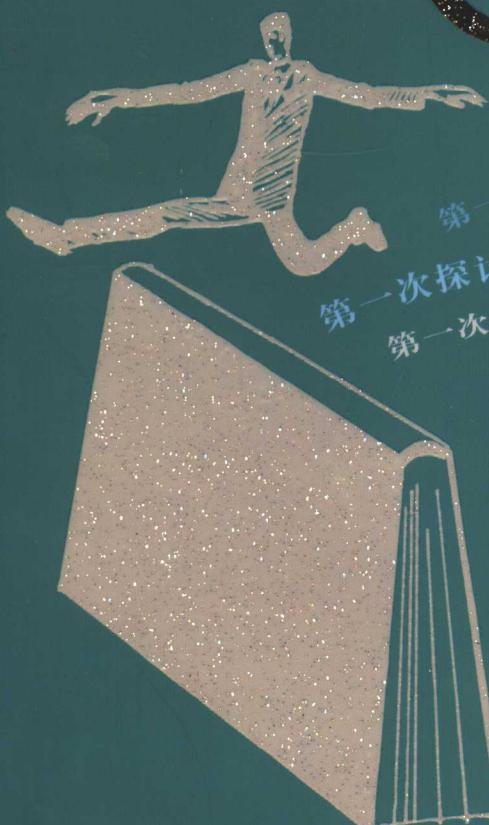


[中小学英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中小学英语跨文化教育 理论与实践



第一次探讨跨文化教育理论
第一次探讨中小学英语跨文化教育方法
第一次结合教材设计跨文化教学活动

鲁子问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www.sjdf.com.cn

国家教育部项目
“中小学英语教育
动态真实原则
推广性实验”
研究成果

中小学英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国家教育部项目“中小学英语教育动态真实原则推广性实验”研究成果

中小学英语跨文化教育 理论与实践



鲁子问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www.sjdf.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小学英语跨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鲁子问著.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10

(中小学英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7-5083-3932-0

I. 中... II. 鲁... III. 英语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G633.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358 号

中小学英语跨文化教育理论与实践

著： 鲁子问

策划编辑：李 艳

责任编辑：赵筱妹

出版发行：中国电力出版社

网 址：<http://www.sjdf.com.cn>

印 刷：北京地矿印刷厂

开本尺寸：190×234

印 张：11.75

字 数：150 千

版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3-3932-0

定 价：25.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62193493**

“读实验”是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中小学英语教育动态真实原则研究与实验”的延续，这一课题倡导“为了提高英语教育质量、教学效率和教学成绩，中小学英语教学应该充分把握英语教育的教育因素的动态真实的内涵，特别是英语教育的真实目的、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和动力的动态真实的内涵、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真实的内涵、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机制的动态真实的内涵、依据英语教育的教育因素的动态真实的内涵，动态地运用语义真实、语境真实、语用真实的教学内容、教材策略、教学方法和技巧、教育技术等”，研究教学方法。

开展以“阅读空间”为内容的“中小学英语真实阅读推广实验”，和为小学教师提供教学资源的“小学英语教育真实原则推广运用”两个子课题。



鲁子问，博士，教授，国家社科基金“外语

政策与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项目负责人，教育部“中小学英语教育动态真实原则推广性实验”项目全国项目组组长，华中师范大学北京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教育学会远程师资培训中心教授，教育部审定中小学教材《英语》（新标准）副主编，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刊《中小学英语教育》执行主编。鲁子问博士先后承担和参加国家与教育部课题多项，编著、主编和参编学术著作十余种，教材和教学用书百余种，发表论文数十篇，在全国进行学术讲座和教师培训数百场。

实的内涵等。依据英语教育的教育因素的动态真实的内涵，动态地运用语义真实、语境真实、语用真实的教学内容、教材策略、教学过程、教学策略、教学方法和技巧、教育技术等”，这一课题倡导真实性和教学方法。

这一课题目前还开展以“阅读空间”为内容的“中小学英语真实阅读教学推广实验”，和为小学教师提供教学资源的“小学英语教育真实原则推广运用”两个子课题。

教育部专项经费项目“中小学英语教育动态真实原则推广性实验”是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中小学英语教育动态真实原则研究与实验”的延续，这一课题倡导“为了提高英语教育质量、教学效率和教学成绩，中小学英语教学应该充分把握英语教育的教育因素的动态真实的内涵，特别是英语教育的真实目

前 言



20世纪80年代，在外语教育领域兴起了一门新学科：跨文化交际学。这是一门研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语言交际时所涉及的文化问题的学科，如怎样理解外国语言中的外在文化、在交际中如何才能尊重外在文化、如何消除对外在文化的“标准像(stereotyping)”现象（即以片面的不变的形象认知外国文化的现象，比如认为英国人都具有绅士风度、德国人都有哲学头脑、日本人都是经济动物等等，这些都是“标准像”，也称“刻板印象”）等等。1986年，笔者接触到这一学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阅读相关的文章。

在随后的深入学习中，笔者感到有必要阅读更深层次的文化学著作，笔者从1988年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相关论述，到1991年逐步形成了从跨文化交际学进入更深层次的文化研究的念头，认为有必要进行跨文化交往的研究，并作了一些初步探索。此后，笔者继续进行跨文化交往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学习和探讨，并在比较深入地学习了文化哲学、实践哲学以及其他当代哲学和文化学的一些理论学说之后，有了一些新的收获，先后在《读书》《新东方》等报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人类跨文化交往的思考与研究的文章。

1996年底，笔者开始学习教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在学习过程中，多次得到郭文安教授的直接指导，使笔者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在倡导跨文化教育，于是计划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是此，笔者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重新阅读一些文化研究的著作，并检索发现和阅读了一些跨文化教育方面的文献，并以对跨文化教育的探讨为基础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也就有了笔者在本书中对跨文化教育的研究与探索。

笔者在教学实验中得到张荣干先生的支持，2000年，在其任教班级开展了一项研究，其中获得了跨文化教育的一些案例。后来，笔者有机会担任《英语》（新标准）的副主编，得以在教材中开展跨文化教育，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

这些年来，笔者的研究得到了很多人的引导、帮助与支持。国家教育部田敬诚处长、华中师范大学石挺处长对笔者的研究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多次出席笔者的实验项目会议，给予笔者很多的鼓励和肯定。

笔者攻读博士学位时期，导师郭文安教授长期引导笔者从更宏观的高度来思考英语教育，引领笔者从一个较低的层次不断攀升，这使笔者的很多研究都能站到一个以前不曾注目的高度。

对以上给予笔者引导、支持、帮助、鼓励、批评和建议的领导、师长、同行，笔者在此表示最衷心、最诚挚的谢意！

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很多他人的研究成果。凡直接引用者，均已在书中一一用括号注明其来源。其他参考文献则已列在书后。

笔者对于中小学英语跨文化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一定还存在很多错误与不足，欢迎广大中小学英语教师以及相关研究与管理者批评指正。

鲁子问

于永争上游斋

2005年9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跨文化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
一、跨文化冲突长期普遍存在	6
二、跨文化冲突尖锐复杂	11
三、走向跨文化教育	15
第二章 跨文化教育概念的基本界定	18
一、文化与跨文化	18
二、跨文化教育的概念	31
第三章 跨文化教育的目标	51
一、跨文化教育的总体目标	51
二、跨文化教育的知识目标	52
三、跨文化教育的态度目标	56
四、跨文化教育的能力目标	61
第四章 国外跨文化教育实践	66
一、多元文化教育	66
二、联合国的跨文化教育	72
第五章 基于英语的跨文化教育方法	77
一、学校英语学科教育中的跨文化教育	78
二、学校其他学科的跨文化教育	93
三、基于英语的跨文化教育主题实践活动	96
四、社会教育中基于英语的跨文化教育	104

第六章 基于英语的跨文化教育活动	110
一、小学英语跨文化教育活动	110
二、初中英语跨文化教育活动	123
三、高中英语跨文化教育活动	140
附 录	151
一、全书总体结构与总体评价	151
二、各章节主要内容与导读	153
参考文献	170



跨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与紧迫性

远自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人猿揖别直至今天，从人类第一项文化因子发生伊始，就不断有着文化间的交往。汗牛充栋的考古文献（沈福伟，1985：第1页）告诉我们，此一原始人群在狩猎或采集时偶遇彼一原始人群，已经开始相互表示友善，学借获食的手段，以强化自己的生存能力；或是为了抢夺生存的必需物品而相互撕打搏斗。显然，这种跨文化的交往对文化发生的启动与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这种与外来文化的交往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虽然只是支流，但其作用依然存在，有时甚至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就如同以传播与借鉴外来文化、反思与批判本民族文化为主要使命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依随人类的发展，文化内涵更加纷繁，人类文化相互摄取与对抗的现象也更加复杂。跨文化交往更是或促进或制约着人类的文化的发展。

回眸中华数千年文化发展的历史，那胡服骑射的果敢抉择，贯通西域的艰辛跋涉、天竺取经的艰险劫数、儒道释的相互整合、七下西洋的恢宏呈现、欧风美雨的悲凄吹打、帝国列强的无端凌侮、维新变法的热血澎湃、共和革命的炮火硝烟、马列主义的传播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发展、苏维埃旗帜的招展飘扬、反帝反修的独立抗争、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的辛酸破冰、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无不折射着跨文化的交往、碰撞与冲突。

这些跨文化交往有些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但也有些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制约。不过这些制约因素的化解又可能促进中华文化更大的发展。比如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华文化的冲突曾经严重制约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但打倒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又为中华文化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任何一种人类文化无不如此，因为与外来文化绝缘的文化在绝对意义上是难以发展的。

一度极势而主宰欧洲文化圈的基督教文化，初显端倪于小亚细亚的一个犹太小镇：朱迪亚。后来，来自这个亚洲小镇的木匠耶稣·基督（Jesus Christ）的神秘灵光在饱经挫折之后感化了罗马人，然后就仗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而给非基督的世界带来了新的宗教，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和拉尔夫在其著作《世界文明史》的开篇写道：“西方文化从来也不仅仅限于欧洲渊源，它的最初基础在亚洲的西南和北非，这些基础又为从印度，最终又为从中国渗入的影响所补充。西方从印度和远东获得了零、指南针、火药、丝绸和棉花等知识，可能还有许多宗教和哲学概念。”（E. 伯恩斯、P. 拉尔夫，1987：1）西方给非西方的馈赠却更多是征服，不过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在这个全球经济、技术、信息一体化的时代，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的跨文化交往更擢发难计，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规避地在任何层面以日益快速、广泛、深层之势，与或此或彼的外来文化相接触。因此，可以说，人类已经不可归地走向了一个跨文化的时代，任何一个人类群体不能不面对千姿百态的外来文化。于是，人们开始谈论人类文化的全面融合，似乎人类正在走向文化一体化的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跨文化”之“跨”的语义通常包括两类：一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如“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一语义域的研究属于 cross cultural studies，这与比较研究是同一层面的概念；二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如“中国哲学对 18 世纪欧洲哲学的影响”，这一语义域的研究可以理解为 intercultural studies，它是对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相互关联现象的研究，但这一研究也包括了比较研究，因为比较是一种关联形态，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比较性的认知。本书所探讨的是 intercultural 这个语义域的研究。

跨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也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我国跨文化研究的已有成果主要是对外国文化、文化交流史的



研究，以及对跨文化交际学、跨文化心理学等专题的研究。

然而，人类社会似乎还没有为人类的跨文化时代的到来准备好欢庆的香槟。尽管与以前任何时代相比，当前人类在交通、物质和信息的距离上都离得更近了，但在文化上，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却似乎依然那么陌生，在心灵上仍然相距那么遥远，甚至更远。在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广泛的深层的跨文化交往出现的同时，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尖锐的跨文化的冲突也随之而来。

跨文化冲突现象是跨文化交往的必然形态，自跨文化交往出现之始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尽管文化之间的交往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但跨文化交往却难以避免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跨文化的冲突，并认真思考如何消减跨文化的冲突。

跨文化冲突存在两种基本形态：非暴力性的摩擦性的冲突与暴力性的对抗性的冲突。

摩擦是跨文化的交往中不断出现的各种误解和分歧导致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争执。而对抗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暴力冲突，严重的暴力性冲突会演化为武装的、军事化的暴力冲突，也就是战争。摩擦是常见的、普遍的，总是不断发生的；而对抗则是残酷的，总是造成生命的伤亡、出现严重的后果、导致长期的文化冲突。同时，也可能因为摩擦长期存在、或无法有效解决、或不断加剧、或不断反复，导致摩擦激化，衍生为对抗，甚至是军事化的暴力性对抗冲突。

跨文化的摩擦时常表现为言语行为上的冲突，如争执、辩论、批评、指责、漫骂、侮辱等言语行为（含撰文著述等书面言语行为），以及游行示威、请愿抗议等政治行为。比如中国与美国关于人权问题上的争执、中国对日本关于教科书（本质上是历史观）问题上的批评等都是跨文化摩擦。

跨文化的对抗主要表现为暴力冲突和战争等，而且在这些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往往是文化因素与政治、经济等因素并存。很多跨文化冲突是由长期的跨文化摩擦积累而成的，这样的冲突往往由于历史原因而难以消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围绕阿约提亚神庙的冲突就是由





于长期的跨文化摩擦不断积累而愈演愈烈地成为暴力冲突。

跨文化的对抗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受到广泛的关注与重视，尤其是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对抗）论”之后，跨文化的对抗性冲突更是成为一个研究的重点。

亨廷顿是卡特总统时期（1976—1980年）的国家安全顾问，长期从事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他于1993年在《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著名的政策建议性论文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S. Huntington, 1993: 22—49)，首次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文明对抗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通常译为“文明冲突论”）。这篇文章是亨廷顿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外交政策的建议，论文发表后，受到广泛的指责和批评。1996年他在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其中文译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8年在国内出版)，非常全面清晰地提出了他的理论，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释与说明。

亨廷顿的理论在国内被介绍为“文明冲突论”，其实他的英语原文使用的不是学者们通常使用的“冲突 (conflict)”一词，而是使用了 *clash* 这个词，权威的《牛津英语词典》对 *clash* 的解释是“武力的冲撞 (collision with force)” (DK Oxford, 1999: 115)。同时，在他的论文和著作中，他所分析的都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他称之为断层线战争。所以，实际上，亨廷顿研究的是文化之间的对抗性冲突，而且主要是文化之间的战争，他所描述的文明的冲突就是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战争。他预言：在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不是不可能发生”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而可能结果之一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S. 亨廷顿, 1998: 361, 364, 365)

为此，笔者认为，从冲突理论来说，亨廷顿的理论的实质是“文明对抗论”，探讨的是极端形式的文明冲突，而不包括非暴力的跨文化摩擦。亨廷顿提出，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不再是冲突的决定性原因，文化将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冲突中起决定性作用，西方文明的最大危险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反对西方，构成西方与非西方的





对立 (the west versus the rest)。此文一出，文明 (文化) 冲突就马上成为全世界的重要的焦点，“它已经几十次以至可能是几百次地成为世界各国论文、专著、探讨会的评论的主题。它在总统们、总理们、学者们和记者们中间引起了理智的辩论。”（王缉思，1999：85）

亨廷顿对跨文化对抗的分析并不是完全学术性的，实际上这篇论文主要是一篇政策建议性的政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完全是从西方的视点去关注文明的对抗，其目的是为了提出一系列的对策，建议西方，尤其是美国，如何面对、消解非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反抗，从而维持西方文化对非西方文化的霸权。他在这篇文章末尾居然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从西方的利益出发，西方显然应该：促进西方文明内部（特别是欧洲与北美成员之间）的合作与一体化；将那些与西方文化相近的东欧与南美文化纳入西方社会；促进和发展与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阻止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激化成文明之间的战争；限制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发展；放缓削减西方军事能力并保持西方在东亚和西南亚的军事优势；充分增加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支持其他文明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赞同；强化那些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组织并鼓励非西方国家加入这些组织。”（S. P. Huntington, 1993: 48）

可以说，他的政策建议只会进一步加剧跨文化的对抗，不仅仅是他要求西方遏止非西方的发展，更为严重的是，他居然建议西方去挑拨儒家文明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充分增加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以免他们走向团结而共同反抗西方，同时也可以削弱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亨廷顿对“文明对抗论”研究的目的是完全错误的。

笔者认为，研究分析跨文化冲突的目的不应该是如何利用跨文化冲突来获得本民族、本国的利益，而应是探讨如何消减整个人类的跨文化的冲突，减少跨文化摩擦，尽可能消减跨文化的对抗，特别是跨文化的战争，促进人类的类文化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跨文化冲突存在两种基本形态：跨文化的摩擦





与对抗，而对抗性的冲突存在演化为战争的危险。

在本书随后的探讨中，笔者将努力探讨如何通过跨文化教育来消减这两种不同形式的跨文化冲突，尤其是跨文化对抗，建构和睦共存的跨文化交往形态、和谐的人类的类文化的发展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

当然，在探讨如何可能消减跨文化冲突之前，我们需要从跨文化冲突的特性对跨文化冲突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这里需要首先特别说明的是跨文化冲突的本质，以及跨文化冲突与政治经济冲突的关系。跨文化冲突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文化冲突的一种（另一种是文化内的冲突，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等）。跨文化冲突本质上是文化利益的冲突，是不同民族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当然常常表现为冲突一方试图侵犯异民族的文化利益而扩大本民族的文化利益，冲突另一方试图抵抗对本民族文化利益的侵犯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利益。

当然，跨文化冲突只是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众多冲突中的一种，实际上，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更为主要、更为常见的冲突是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

不过，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很多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往往以文化为外在形态，同时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很多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中包含着文化利益冲突，当然更多的则可能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冲突，如国际政治权利冲突、国际贸易冲突、民族地区资源开发权的冲突等。

广义地说，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绝对纯粹的政治经济冲突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当代人类社会的冲突都包含着跨文化冲突的因素。因此，我们既不能无限扩展跨文化冲突的范围，也不能不看到，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的确包含着的跨文化冲突的成分。

一、跨文化冲突长期普遍存在

当我们从文化的视点环视人类历史与现实时，我们能够看到在各个历史阶段、在当今各个国家、各个社会文化层面都普遍存在此式彼样的



跨文化冲突，只是激烈与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无论古今中外，跨文化冲突都广泛普遍地存在着。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史，同时也有着悠久的包含着跨文化冲突的跨文化交往历史，而且中国文化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因此，中国文化难以避免地与其他文化存在这样那样的冲突。今天的中国依然面对着纷繁的跨文化冲突。

中国与欧洲在价值观、宗教、经济等问题上存在冲突。

近代以来，中国与欧洲文化圈就一直处于征服与反征服的冲突状态。即使在欧洲与中国的战争状态结束之后，欧洲也一直指责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支持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分裂势力，欧洲基督教宗教界一直试图重新控制中国的基督教会，欧洲还经常利用各种经济政策制约中国，甚至出现欧洲企业故意在中国低价收购产品，然后批评中国向欧洲倾销产品这类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欧洲曾经先后试图从宗教、医学、教育、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将中国变成一个欧洲的文化附庸国。（J. 斯宾塞，1990）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有着不少的共同之处，相互也有借鉴学习的成功事例，双方也有形成良性的跨文化交往的共同的文化利益基础。但中美之间的跨文化冲突更为显见，而且冲突的历史比美国的国家历史还长（实际上在美国独立建国之前，来自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时就出现了跨文化冲突），这种冲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长期存在。这是因为，正如亨廷顿所说，“美国与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共同利益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美国坚持其国家利益至上的背景下），“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S. 亨廷顿，1998：254）。

尽管这一观点非常片面，夸大了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分歧，对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视而不见，而且执意于强化这种差异与分歧，而不是努力来消解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分歧，但这种观点在美国一些反华人士中仍然大行其道。





不可否认，中美文化的差异表现在各个方面。在日常生活方式上，中国日常生活文化更强调精神的和谐与满足（这不是绝对性描述，只是用“更”表达的倾向性描述）和家庭的共同感受，而美国的日常生活文化（这里指的是美国的西方文化特征）更看重物质的占有和个人的自在；在团体上，中国的群体生活文化更强调权威与集体，而美国的群体生活文化更强调个人的独立，不太重视权威的价值；在历史观方面，中国历史观通常更重视悠久和长远的历史，重视过去的现实感受与现实的历史意义，而美国的历史观更强调当下，几乎没有真正的历史感受；在价值观方面，中国文化更重视社会，更认同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美国文化则更重视个人，更认同个人自身的价值；在法律意识上，中国法律文化更强调法律应该服从道义，认为理大于法，理是立法的基础，而西方文化则更强调法律的自然基础，强调法律高于一切；同时，西方文化更强调信仰，认为人必须有某种宗教信仰，而中国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几千年文明历史中（佛教传入中国不过两千年）并无真正的宗教信仰，当代中国国民中的大多数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

中美文化之间不仅仅存在这些差异，其实还存在更多的共同与相通之处。中美文化都是没有国教的世俗社会文化，宗教对社会不具有绝对控制力，因此中美文化的基础都是现世（现实）主义的。中美的国家制度都是共和国，没有国王、皇帝等世袭权力。中美的经济制度都是市场化的，尽管在市场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但社会的基本经济价值取向都是市场化的，因此经济利益往往能成为中美之间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

其实，当前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现实的政治冲突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军事冲突，这一冲突在深层上表现为政治价值观的冲突。

而且，当前中美之间的政治价值观冲突实际上主要是单向的，是美国试图将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强加给中国而导致的冲突，而中国并没有试图强迫美国接受中国的政治价值观。形成这一冲突的历史原因是美国的西方普遍主义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外向扩张性。有些美国政治家或政治专业人员从来没有亲自到中国看看，也没有获得深入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知



识，可以说根本不了解中国，他们却总是不断攻击中国。以反华为自己的政治标志的美国参议员赫尔姆斯从没有到过中国，但却每年都要提出反对中国的议案。美国报刊杂志上的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栏作家根本就没有来过中国，也没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过，仅仅依靠一些美国新闻媒体上对中国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报道，就恣意妄地对中国横加指责，其所谓的证据却往往与中国的事实南辕北辙。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想了解中国，他们攻击中国的目的只是要向中国强加美国的政治价值观。

更为关键的是，在中美交往中，美国总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惟一的行为目的，却毫不尊重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在中国文化中，“国”和“家”一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尽管非常清楚中国文化的这一观念，但并不尊重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的“家”情结，长期把台湾问题作为“国”的问题来处理，导致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纠纷不断，并时常以其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力量来介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矛盾。

美国出于其国家利益，长期试图将中国变成像日本那样的美国利益的附庸国，在培植中国国民党政府失败之后，就长期将中国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美国除了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对抗中国之外，更是在文化领域与中国广泛对抗。美国长期扶持各种反对中国的力量，经常利用人权、民主、司法等问题对中国进行干涉，对中国社会在新闻报道中进行“妖魔化”宣传。

毫无疑问，只要美国在中美交往中坚持其美国利益至上的观点，中美之间的跨文化冲突就会长期存在。

在亚洲其他国家，跨文化冲突也广泛存在。其中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欧美国家的基督教文化的冲突更是成为当今国际上最严重、最激烈冲突，在“911事件”中更是登峰造极，已经成为深刻的跨文化冲突的历史标志性事件。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冲突短时间难以终止，同时还存在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冲突，阿拉伯民族与分散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的库尔德族的冲突，波斯族的穆斯林与阿拉伯族的

